
湖南近代棉纺织的发展及其影响

熊元彬

【摘要】 湖南近代棉纺织在前清发展的基础和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烈刺激下，既受到了洋纱、洋布的冲击，同时也促使棉纺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内倡导发展实业和国货运动的多重推动下，洋纱、洋布、国产纱在湖南棉纺织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湖南近代棉纺织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关键词】 湖南；近代；棉纺织；发展；影响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湖南手工业研究”（16YBQ064）

【作者简介】 熊元彬，历史学博士，湘潭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湖南 湘潭，411105）

学界从行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因素及其运作机制、外销等着眼，分别对湖南清代、民国时期的手工业作了诸多的论述^①，但是对于近代湖南棉纺织则尚无专题论述。实际上，作为手工业中最为典型的行业，棉纺织不仅是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产业和列强占领国外市场的重要商品，而且其原料变革中的机制洋纱更是工业革命的源头和近代手工业兴起的标志^②，因而从前期湖南棉纺织的概况着手，对湖南近代棉纺织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专题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的透视出湖南手工业的发展历程，而且还有益于纵览湖南工业化的发展特征。

前清湖南棉纺织的发展

湖南棉纺织出现较早，“五代时随着植棉技术传入湖南，棉纺织业也开始发展起来。”^③但是，湖南普遍植棉与全国内地一样，都基本始于宋末元初。早在 1289 年，元朝政府就在两湖一带设立了木棉提举司，规定每年征收定量的棉布^④。随着湖南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湖南棉花种植逐步得到了扩展。

清初，湖南“只有津市和宝庆桃坪等少数地区种植棉花”。其中，前者产于湖地，名曰“湖花”，而后者则种植于山地，名曰“山花”。就需求而言，两者“仅足当地人民衣食之资，鲜有运销市场者”。湖南全省所需之棉，“仍取给于”湖北所属的公安、孝感、黄石港等地。^⑤

①王继平：《论清代湖南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任放：《论清代湖南手工业行会的运作机制》，《求索》2001 年第 10 期；刘云波：《论近代湖南的集中外销型手工业》，《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张绪：《民国时期湖南手工业研究》，2010 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②熊元彬：《机制洋纱引发云贵内外市场联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2 月 20 日。

③周秋光等：《湖南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08 页。

④《元史·世祖纪》，中华书局，1983 年。

⑤孟学思编：《湖南之棉花及棉纱》__上编，湖南经济调查所，1935 年，第 17 页。

湖南棉花分为黄白两种，其中以白棉为主，而黄者俗称紫花，种植较少。岳州巴陵县北部产棉，尤以巴陵东乡的棉花质量甚佳，而华容则以南山之棉为最佳。嘉庆年间，丰石石门县“女红克勤纺绩，邑种桑麻甚少，多买木棉弹纺成布，比户机声札札。”^①在宝庆邵阳县，棉花的品种不断更新，邵阳“县旧产木棉，称曰山花，色黄而温，远胜他处所产。后颇喜种湖花”。

湖南棉纺织集中于衡州、岳州二府。巴陵县“妇女工织纤……每行乡间，闻机抒声、络纬声。”^②巴陵滨湖有“人工作布”之称，最初，“邑之山中多作小布，帽裁尺，红之可巾，且以张彩饰棺柱，青者以为鞋与带”。巴陵小布备受欢迎，即使是在省城长沙，也有“巴陵小布行”。此外，湖南“二三都及冷铺、三港诸处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时人称“一都”所产之布为“都布”，而“二三都”所产之布为“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之，布少粗而多。”但是就市场而言，这些布仅限于本省，主要销售于长沙、益阳、湘潭等地，“岁会钱可二十万络”。^③莫阳县妇女“勤纺绩，工缝纫，操作不辍，无论衡门富室大都类然”。^④

虽然湖南棉产量明显高于云贵等地，如，“黔省不能产棉，除苗族少数自织麻布外，全境所需布正，都仰给于外省”^⑤，而云南则地接他国，“惟安南、东京棉及缅棉，向为输入大宗，省会各县多购用之。”^⑥其中贵州思南，“木棉地不甚出，岁由常德运至”^⑦。但是，作为多雨的南方，湖南的棉产量仍有不足，仍须以苧麻作为布料之补充。湖南盛产麻，其品种较多，有苧麻、棠麻和火麻等数种，其中以苧麻最为常见。而且，在苧麻中又可分为紫麻和白苧两种，“俱岁三刈，每亩可数十斤，贩贸南省，获利甚饶”^⑧。苧麻手工纺织有着较早的渊源，其中夏布（又名苧布）就是湖南典型的麻纺织品，尤其是醴陵“手工业之特产，品质之佳，冠于全国”，但是醴陵夏布所需的苧麻“多由”湘潭、沅江、湘乡、攸县等处，“自出甚少”^⑨。郴州的苧麻以南乡为多，“南乡水田宜苧麻，居民多以倍租佃田植麻，利获数倍。”^⑩耒阳县每年约产1,000余担，苧麻除在本地销售外，还“陆运兼水运出境，在坪市、韶州等处销行，每岁约万余担。”^⑪其中，浏阳、攸县、茶陵、湘乡“皆出苧布”，但是尤以“浏阳最佳。”就产量而言，浏阳夏布价“高而（量一引者注）少”。在市场上很有声誉，以致一些生产者冒称浏阳夏布，以便打开销路，如江西的麻布原料苧麻就主要来自湖南醴陵，因而在不知有醴陵夏布之时，“托为浏阳夏布”。^⑫

晚清湖南近代棉纺织的兴起及其发展

晚清不仅是整个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而且也是湖南近代手工业的兴起之时。据《汝城县志》所载，光绪之前，湖南汝城“未有织布业”，之后才“渐见增进”^⑬。洋纱输入及其采用是近代棉纺织，甚至近代手工业兴起的标志。仅文献考察而言，洋纱在湖南的畅销及其大量采用是在岳州开埠之后，“自近年设立洋船税关，生意顿盛。洋纱一纵，尤为畅销”^⑭。

传统棉纺织大多自给自足，而近代以降，有部分民众则因“贫者耕不足恃，恒赖此支半载食用”^⑮。此外，传统生产方式为男耕女织，而近代湖南男女不仅分工更加明显，“女织男贩”，往往“农工少隙，十十五五结队西赴江址者几无日不有”^⑯，而且男性亦从事纺织业。如湖南乾州厅“各乡存多苧棉花，男女并织”^⑰。

①苏益馨修，梅峰纂：《石门县志》，第18卷，风俗，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②杜贵墀等：《巴陵县志》，光绪十七年，第52卷，杂议二，第7页。

③杜贵墀等：《巴陵县志》，舆地志七，清光绪十七年刊本，第4页。

④转引自王晓天主编：《湖南经济通史·古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31页。

⑤于曙峦：《贵阳社会的状况》，《东方杂志》1924年第6期。

⑥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142卷，工业考，纺织业，1949年铅印本。

⑦夏修恕等修，萧瑄等纂：《思南府续志》第2卷，地理门，风俗，清道光二片一年刻本。

⑧张云敖修，周系英纂：《湘潭县志》第39卷，风土下，土产。

⑨傅熊湘编：《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夏布，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⑩郭树馨等修，皇榜元等纂：《兴宁县志》第5卷，风土，风俗，清光绪元年刻本。

由此可见，迟至光绪年间，巴陵棉纺织分工较为明显。据地方志所载，巴陵“产棉花，秋冬远近肩贩，妇女纺织，宵旦勤劳”。邵阳“更多种洋花”，以作织布之需。其中，“山花最上，湖花次之，洋花最下。”^③ 光绪年间，慈利县产棉较多，常运销省外，附郭及楼以北均产棉，“而在楼以北者良，贩者多捆以人蜀及鄂西鄙，盖慈利之棉盛矣”^④。

光绪年间，湖南滨湖州县淤州日张，“民间种棉花者亦日加多。”^⑤ 特别是慈利县，不仅产棉纱，“不需外求”，而且其所产的布正，“时髦花样近亦能步骤”。^⑥ 宣统年间，湖南植棉区域发展至 31 个县，其中以临湘为最，年产量约 5，000 担，其次则是湘乡、衡山、华容、永明、攸县、巴陵、茶陵、泸溪、安乡、桃源、沅江、澄州、慈利、沅江、桂阳、石门、安乡、安福、龙阳等州县；再其次为长沙、醴陵、湘阴、浏阳等县。此外，善化、零陵、祁阳、安化、桂阳洲、靖州、东安、清泉等也种植棉花。总体而言，近代之后，湖南棉花种植区域主要集中于北部，尤其“以临湘最多，长沙、浏阳等处次之，善化又次之”^⑦。

湖南岳州、常德、澧州等县最重要的产品就是“南京布”的棉布，这些棉布经岳州海关销售的只有小部分，而大部分则销售于内地。但是，常德的大布则远销广东、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据估计，益阳年产 100 万匹大布，其中以兰溪为纱布销售的集中地。布商云集长沙，每年产布的贸易额以百万计。^⑧ 同治年间，益阳妇女仍“多勤于纺，出棉布以衣”。^⑨ 同时，虽然永州府祁阳县的工匠“只供本地宫室器用之需，从无奇技淫巧矣以眩世俗者”，但是“惟葛布一物，甲于他处”。^⑩ 在益阳街头，还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布”、“土布”的家庭手工作坊。

同治年间，长沙苧麻“栽种甚广”，即使是“城中隙地亦然”。但是，当时长沙苧麻“只供贩运，未曾沤麻织布”。^⑪ 苧麻是永定县各乡的特产，“为土物上品”，不仅远销江西、广东等地，而且还“水运出洋”，年销量约 5，000 捆，年产值 10 余万钱。运销江西的苧麻作为夏布练麻线之用，但贩运量“不如广东之多”^⑫。浣江县苧麻产量甚多，以致汉口商人在浣江设庄收购，并将其称之为“沉麻”，但因有来自汉寿县者，因而“亦汉寿山乡大宗出品”。^⑬

作为布料的重要原料，晚清时期，苧麻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治年间，湖南浏阳、攸县、醴陵、湘乡、茶陵“皆麻乡”，过去武陵、巴陵、郴州、道州“皆贡练苧，今则并浏阳上供亦裁。”特别是炎热的夏季，还有专门的苧市，“捆载以售。”^⑭ 但是，在诸麻乡当中，又以浏阳、醴陵的夏布业为主，而夏布的品质则“以浏阳为佳，而产量则以醴陵为多。”^⑮ 据醴陵地方志所载，

⑪《未阳县乡土志》下编，物产，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⑫王汝惺等修，邹俊杰等纂：《浏阳县志》第 7 卷，食货，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⑬陈必闻、宛方舟修，卢纯道邓纂：《汝城县志》第 18 卷，政典志，实业，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⑭本省近事《城陵矶近讯》，《湖南官报》第 409 期。

⑮赵勳等修，王元凯续修：《攸县志》第 18 卷，风俗，清同治十年刻本。

①田兴奎等修，吴恭亨等纂：《慈利县志》第 6 卷，实业第三，民国十一二年铅印本。

②《乾州厅志》第 13 卷，物产志，光绪年刻本。

③陈吴萃等修，姚炳奎纂：《邵阳县乡土志》第 4 卷，地理志，商务，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④光绪《慈利县志》第 6 卷，食货第五，物产。

⑤《光绪政要》，实业八，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湖广总督赵尔巽奏推广农业种棉织布情形。

⑥田兴奎等修，吴恭亨等纂：《慈利县志》第 6 卷，实业第三，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⑦湖南省“望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望城县志》，三联书店，1995 年，第 301 页。

⑧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第 673 页。

⑨益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益阳市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 220 页。

⑩陈玉祥等修，刘希关等纂：《祁阳县志》第 22 卷，风俗，清同治九年刻本。

⑪赵勳等修，陈之麟纂：《效县志》第 52 卷，物产，清同治十年刻本。

光绪初年仅醴陵夏布每年输出额就达七八十万元，不仅运销国内的汉口、南京、上海、苏州、杭州、两广、山东等地，而且“亦有输出南洋爪哇及外国者。”^① 朝鲜人，“尤喜用作衣料，并用以裹尸”。^②

醴陵夏布产量甚多，但是“外间只知有浏阳夏布，而醴陵则无闻焉”。其原因莫不三方面。一方面，醴陵没有本地庄客，“不能大批收买直接输出”；另一方面，贩运醴陵夏布的小贩“信用低落，外商不敢径来批夏”；第三，醴陵交通不便，“不及浏阳直达省河之便。”直到民国时期，“始有醴商运往各埠销售，而外间亦渐知浏阳夏布实出自醴陵”，以致醴陵夏布“乃得直接自卖。”^③

晚清时期，巴陵的布有大小数种，其长、短、阔、狭均有差异，“远商收买，岁可得二十余万络，邑之利源多出于此”^④。时至光绪年间，石门县的纺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县东南产木棉，而南乡之产最上，其绒松易纺，质软性温，土人工作布，充幅四丈，谓之匹，阔尺四寸，狭者减二，重或二三斤云”。贩运的集散地设有布庄：如夏家巷、宝灵桥、中五通、白洋湖、上五通皆设有庄，“庄客五日一会，市捆而致之常德，岁得络钱三数万也”^⑤。布庄的出现，表明棉纺织业开始脱离了自然经济，已发展成了一种商品性行业。

清末十年，湖南滨湖各县逐渐发展成为集中的产棉区。1910年，据农工商部调查，湖南产量最高的临湘，年均产量为4.37万担，其次为华容，达3.98万担，再其次为常德，达3.38万担，三县合计年均产量为11.73万担。但是，清末至抗战前，湖南的棉产量并不高，“常年仅28万余担，十足年成亦不过30余万担，不足之数达30万担以上”^⑥。

湖南棉纺织本属家庭手工业，有专门织布的机工，但无专设机坊，“更无所谓布厂”。即使民国出现了现代棉纺织，但是家庭手工纺织仍占90.2%，织布作坊和贫民工厂占9.4%，纺织厂仅占0.4%。^⑦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列强在湖南兴办工程，倾销洋纱等商品。由于洋纱为机制品，价格低，加之税收低于土纱，海关名义为值百抽五，但实际不足5%，使洋纱易于进入湖南市场。据统计，1895年洋纱在湖南每包300斤的售价仅为57两，而同样重量的土纱售价则高达87两，洋纱比较土纱低了47.4%。^⑧ 湖南棉花年产量为10—20万担。^⑨

浏阳夏布的原料为苧麻，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前清时期，湖南苧麻的种植得到了一定的扩展，时至清末，在湖南75县中已有27个县产麻，年产苧麻约100,000担^⑩，而平江一县的苧麻年产量可达10,000担^⑪。就质量而言，夏布特别精细，甚至有“一衬重止二两，累五六年犹不及匹”。因而苧麻织成品“绝不暇外售”，即使进入市场，其织成品亦“皆非其绝精者”，以至于“战天下之商务，未尝遇敌”，“岁售银百十万”。据维新志士谭嗣同所载：浏阳“女红两年余始能成一匹。匹四丈八尺，可为二衬，一衬之重裁三两余”^⑫。

但是，就来源而言，则由醴陵产的夏布居多，“醴陵实居强半”，只不过最初醴陵交通不便，所产夏布大多运至浏阳，然后再外销各地，从而造成名义上均为浏阳所产。

洋纱洋布对湖南的输入及其影响

有学者认为：“清末10年，湖南的洋纱进口较为缓慢，似可映现湖南经济受外部因素之影响不大。民国初年，洋纱进口陡

^⑫王树人、候昌铭编：《永定县乡土志》下篇，物产第十二，民国九年铅印本。

^⑬曾继梧等编：《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物产类，汉寿，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⑭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第14卷，“瞩草类·苧麻”，同治九年左右刊。

^⑮朱羲农、朱保训编纂：《湖南实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28、830页。

增。”^{⑬4}但实际上，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烈刺激下，湖南洋纱进口量较为迅速，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1900—1911 年岳州、长沙海关进口洋纱统计表

年份	岳州关		长沙关		合计	
	担	关平两	担	关平两	担	关平两
1900	573	14,838	—	—	573	14,838
1901	1,119	33,804	—	—	1,119	33,804
1902	3,168	95,332	—	—	3,168	95,332
1903	9,017	262,029	—	—	9,017	262,029
1904	7,555	187,155	3,445	84,786	11,000	271,941
1905	3,034	78,745	4,434	115,913	7,486	194,658
1906	3,967	100,494	4,289	110,312	8,256	210,806
1907	12,707	318,097	7,793	194,975	20,500	513,072
1908	5,490	138,742	5,252	136,582	10,742	275,324
1909	8,650	203,178	12,794	323,152	21,444	526,330
1910	14,257	356,503	21,783	549,119	36,040	905,622
1911	20,141	505,584	32,696	825,862	52,837	1,331,446
1912	19,741	492,860	70,565	1,766,049	90,306	2,258,909

资料来源：曾赛丰、曹有鹏编：《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第 2 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24 页。

从上表可知，1900 年输入湖南的洋纱为 573 担，但时至 1911 年，仅 11 年间就增至 52,837 担，净增长率达 90 余倍，年均输入洋纱达 4,403 余担。清末年间，洋纱、洋布一直是岳州、长沙进口洋货值的前两位。据统计，湖南进出口洋布的总值从 1900 年的 407 关平两猛增至 1911 年的 320 多万关平两。^①长沙开埠当年，洋纱输入量不及岳州的一半，但次年则反超岳州的进口量，印证了长沙商贸中心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鸦片种植后，输入湖南的外国机制纱、布逐年增多”^②。据统计，长沙、岳州两关以棉纱进口为大宗，在 1900

①傅熊湘编：《醴陵乡土志》第 6 章，实业，夏布，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②陈鲲修，刘谦等纂：《醴陵县志》第 6 卷，食货志，工商，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③傅熊湘编：《醴陵乡土志》第 6 章，实业，夏布，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④同治《巴陵县志》第 11 卷，风土，风俗。

⑤光绪《石门县志》第 6 卷，物产。

⑥转引自蒋子云等：《湖南省纺织工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6 页。

⑦转引自蒋子云等：《湖南省纺织工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2 页。

⑧欧阳志高、田均耕等：《湖南财政史》，中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37 页。”

⑨方秋声：《中国棉产之动态》，《东方杂志》第 23 卷第 7 期。

⑩龚胜生：《晚清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5 年第 2 期。

⑪湖南省平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平江县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00 页。

⑫谭嗣同：《浏阳麻利述》，《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90 页。

⑬冯天瑜等主编：《人文论丛》2012 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55 页。

- 1930 年，两关合计进口棉纱量为 81 . 13 万担，进口值 2495 . 08 万关平两。抗战爆发后，洋布来源受阻，以致中国手工纺织业“始重获抬头机会，乡间无数弃置之纺车布机，复行取用”，从而出现了“战时手工纺织业之畸形繁荣现象”。这种现象“尤以湘省为最显著”，以致湖南“顿成战时中国纺织业的重心”，诸如贵州、两广等西南各省如“均有赖于湘产土布之接济”。^③

作为一种织布原料，质优价廉的洋纱向棉料不足的地方输入，可谓一大进步。湖南嘉禾县不仅不养蚕，“无丝织物”，因而“往往买洋纱上机”，使其成为洋纱“外货一大销场”。^④ 20 世纪后，湖南进口的洋纱不断增加，一些地区从家庭手工业发展为织布机作坊，至 1921 年左右已极为发达。^⑤ 1931 年，湖南遭遇水灾，全省棉产量仅有 4 . 5 万担，次年恢复到 20 万担。30 年代，棉产区从滨湖扩展至湘西、湘中、湘南一带。时至 1941 年，湖南棉产量达到 43 . 5 万担。

继洋纱之后，洋布也大量输入湖南，致使湖南境内的苧麻种植面积大为萎缩，夏布产量一落千丈，“岁人之利，骤减六七十万”。^⑥ 岳州、长沙开埠之后，湘潭、常德也成为寄港地，“自是洋纱洋布，随各国船舶所及，深入湘省腹地，农民副业，遂为所夺，农村生产力，逐渐破坏。”^⑦ 据《湖南官报》所载，岳州“自近年设立洋船税关，生意顿盛。洋纱一宗，尤为畅销，业此者现有四十五家，而每日所获，各部下三、四百金”。洋纱不仅质优价廉，而且操作“省工，织出之布，匀净光洁，四乡贫家妇女，必借此谋生云”。^⑧

以洋纱为原料的织布业，也因为生意暗淡，“大有江河日下之势”。^⑨ 清末，常德土布业处于“最盛时”，主要集中于常德有 300 万正，值银 500 万两“之巨”，其来源除常德各乡之外，还有桃源、临澧等地，“而以常德、桃源为最多”。其产品有“东大布”（产于东乡）、“北宽布”（产于北乡）、“二细布”和“三细布”（庄口）、“漆河布”（产桃源）、毛蓝布、麦青布（染色者）等。就销售而言，常德的土布远销湘西、川滇黔、两广及江西等地，其中“蓝布以土靛染色，永久不退，尤以麦青为佳”。但是“自洋布侵入后，逐渐减少”。^⑩

即使是长沙，也不例外，“土布销行亦滞”^⑪。可见，湖南开埠之后，棉纺织受到了较大地影响，其中妇女绩麻、纺纱作为农村的副业，“自洋纱畅销以来，纺土纱者甚少。”^⑫ 在嘉禾县，纺花者少，她们“往往买洋纱上机，实为外货一大销场也。”^⑬ 相对洋纱增长率而言，洋布是输入增长率更大，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①周峻峻、李国良、易显凡：《岳阳市日用工业品贸易志》，岳阳市商业局编，1993 年，第 54 页。

②《湖南省志》第 9 卷，工业矿产志，轻工业，纺织工业，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513 页。

③转引自蒋子云等：《湖南省纺织工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3 页。

④王彬修，雷飞鹏纂：《嘉禾县图志》第 17 卷，食货篇第九中，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⑤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发行：《中国实业志·湖南省》，1935 年初版，第 119-154（乙）页。

⑥谭嗣同：《浏阳麻利述》，《农学报》第 12 册。

⑦曾赛丰、曹有鹏编：《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第 2 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 页。

⑧《城陵矶近讯》，《湖南官报》第 409 期。

⑨化之：《邵阳农村经济之一角》，《农村》1934 年第 1 卷第 32、33 期合刊。

表 2 1900—1911 年岳州、长沙海关进口洋布统计表

年份	进口值(关平两)		合计	年份	进口值(关平两)		合计
	岳州	长沙			岳州	长沙	
1900	407	—	407	1906	32,750	926,194	958,944
1901	70,104	—	70,104	1907	84,594	2,076,924	2,161,518
1902	119,785	—	119,785	1908	142,683	2,082,103	2,224,786
1903	840,112	—	840,112	1909	194,322	2,471,454	2,665,776
1904	437,200	794,938	1,232,138	1910	212,486	2,151,961	2,364,447
1905	43,664	1,236,682	1,280,346	1911	409,090	2,879,162	3,288,252

资料来源: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 年,第 486 页。

由此可见,洋布也从 1900 年的 407 海关两激增至 1911 年的 3,288,252 海关两,增长率更是高达 8,000 多倍,年均进口洋布总值达 274,021 海关两。1906 年《商务官报》也同样记载:输入衡阳的外国货“以棉纱、棉布为多”,其

中每年输入的“竹布”约 1,000 余箱(每箱 40 匹,每匹 40 码),洋布约 2,000 余捆(每捆 20 匹,每匹 40 码)。湖南商埠的开通,使洋纱大量输入湖南各地,不仅促进了湖南织布业的发展,而且还湖南土布转销外地创造了方便,继而促进了湖南的商品化发展。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1902—1912 年湖南海关出口土货棉布价值表

年份	出口价值(关平两)		合计	年份	出口价值(关平两)		合计
	长沙	岳州			长沙	岳州	
1902	—	1,160	1,160	1908	7,828	42,522	50,350
1903	—	24,576	24,576	1909	866	72,106	72,992
1904	18,351	2,386	20,737	1910	1,332	99,296	100,628
1905	55,853	1,202	56,065	1911	205	70,150	70,355
1906	97,200	12,348	109,548	1912	3,580	45,550	49,130
1907	1,525	85,947	87,472				

资料来源:曾赛丰、曹有鹏:《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第 2 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32—334 页。

从上表可知,长沙开埠当年,岳州的土货棉布出口量就比上一年递减 10 余倍。但是,长沙与岳州出口棉布的价值趋势并不稳定。

洋纱、洋布的“畅销”致使湖南的棉花产量大为减少。据 1903 年《湖南官报》所载:言城陵矶目前情况乃是“惟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目贱,且无有问津者”。^⑥

①罗伏珍:《常德县调查笔记》,《统计月刊》1933 年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

②长沙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长沙文史资料》第 10 辑,1984 年,第 188 页。

当然，湖南各地棉纺织受到洋纱打击的程度和时间有别。其中，长沙、岳州等商埠城市的棉纺织在清末开埠之时，就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备受排挤，而醴陵“自民国初年以来，洋纱逐渐排斥土纱”，特别是 1921 年以后，醴陵“乡间遂不复有纺纱者。”直至抗战爆发后，由于战时所需，“纺纱始有利可图”，才恢复了土纱业。至于织布业，在清末民初发展实业的倡导下，致使民国初年醴陵县城一带“盛行仿造洋布及花纹布、电光布”，甚至一度多至数十家织布厂，每家多至百架织布机。

湘潭经销棉布、棉纱的大商店，主要是江西帮。其中，较大的有荣茂隆、恒和协、荣茂生、郑恒丰、生茂茂、怡记、仁昌、谦和等几个。据统计，湘潭经销棉布销售量年值 128 万两。就棉布来源，“以上海制品最多”，其次为美国制品，“至于日本制品，在市场上则看不到。”在湘潭经销的洋布，“都是染色以后才制成衣服，直接使用本色布者很少。”湘潭本地居民，大都为农夫舟子，服装粗陋，“所需棉布多为土布，用洋布者很少，故洋布输入为数不大。”清末十年，湘潭市场上仍是“土布销路压倒洋布”，甚至可以说“洋布所占比例，不过为土布的补充而已”^①。

湖南“漂业盛衰，随夏布业及土布业为转移”。民国时期，由于“布业渐衰，漂业亦随之不振”，而洋纱的使用则是促进织布业发展的重要因子之一。湖南人采购洋纱织布，继而使染织业在清季“已颇发达”。道光年间，醴陵南乡人开设“茂康染铺”。民国之后，随着“乡间织布者日多”，“染坊亦随之增多”，其产品以“清布最佳”，运销江西、湖北等地。但是，染织原料已“改为舶来”的黑靛粉，传统的染料蓝靛亦随之“绝迹”。^②

洋纱洋布在湖南棉纺织市场的竞争

在湖南夏布产量“骤减”的同时，国内加强了实业发展，继而使国内外相继争夺洋纱、洋布市场。嘉禾县土棉纺纱“间有不能给”，因而“多洋棉、湖棉”^③，其洋纱主要来自广东、湖北及湖南本地。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形成，以及国内洋务运动的进一步推动，国内实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不仅使湖南棉纺织技术却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而且其生产规模也明显扩大。1875 年，湘乡县城出现了第一家使用投梭布机的织布机作坊。之后，湘乡织布机的数量不断增加，至 1937 年抗战爆发前，湘乡县城合计有大小不等的织布机作坊何纺织厂 70 余家，织布机 250 多台，产棉棉布 20 多万匹，合 200 余万米。^④

1895 年甲午战争是日本纱战胜印度纱重要的转折点。^⑤据海关统计，1903 年仅在岳州销售的洋纱约 9,000 担，而销往其它各地的洋纱又有 2,300 担。从洋纱的产地来看，输入岳州的洋纱以日本纱为主，占 1,644 担，而印度纱仅有 663 担，岳州“销者日本纱约居二分，印度纱约一分”。甚至调查还显示，在岳州、常德、澧州等地的织布者中，“近来全系参用洋纱”。^⑥

洋纱输入湖南之前，湖南的布正极为粗劣。^⑦洋纱输入之后，加大了竞争，以致不少地方开始改良土布，不仅幅门加阔，而且在设备上采用了脚踏铁木机。洋纱与土纱作为织布的原料，织成品既结实而又匀细，所以最为畅销，以致鸦片战争之后输入湖南的洋纱、洋布逐年增加，甚至成为湖南进口大宗。1903 年，岳州销售洋纱为 9,000 担，内地行销 2,100 担。^⑧当时，洋纱在常德极为受欢迎，以致洋纱“销场极旺，每年不下二百万两。”此外，洋布在常德的销售也逐渐增加，至辛亥革命之前，常德棉布市场的 40 % 已备洋布所占领。^⑨

③陈鲲修、刘谦纂：《醴陵县志》第 5 卷，食货志，农业经济，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④同治《嘉禾县志》第 17 卷，食货篇，第九中。

⑤《湖南官报》1903 年 6 月 20 日。

①日本外务省：《清国事情》下册，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 年，第 253 页。

②陈鲲修，刘谦等纂：《醴陵县志》第 6 卷，食货志，工商，民国三于一七年铅印本。

③王彬修，雷飞鹏纂：《嘉禾县图志》第 17 卷，食货篇，第九中，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④《湘乡县志》第 12 卷，工业，湖南出版社，1993 年，第 337 页。

1907 年以前，湘潭的棉纱以湖北和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 1907 年日本外务省所载：两三年前，“旧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据湘潭人所言，由于日本纱有光泽，斤两也比其他棉纱每包多 10 数斤，所以人们相对喜欢日本纱，“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而“其他棉纱已不留踪影。”^①

国内洋纱、洋布市场竞争力的增强与归国留学生和商人兴办实业的不断努力有着密切的关联。1902 年，禹之谟从日本考察回国，带回 4 副铁木混合织机组件。1903 年，禹之谟将湘利黔织布工厂从湘潭直接搬迁至长沙，并扩大生产规模，附设工艺传习所，雇佣 40 多名员工，试图大力发展织布业。1904 年禹之谟又将设备迁至长沙，扩大生产规模，继续经营，主要产品有毛巾、布正。此外，禹之谟还设立工艺传习所，培养纺织技术人才，其艺徒遍及湖南省内，从而促进了湖南纺织业的发展。时人指出，“湘省之有机织，自君始”。^②

除了浏阳、醴陵所产的夏布与洋布争夺市场之外，宁乡县的夏布也较为兴盛，并都远销外地。每年四、五月，宁乡“夏布盈市，余者亦捆载他售”^③。湖南开埠之后，夏布更是大量远销海内外，具体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1901—1912 年湖南海关出口夏布量统计表

年份	出口数量(担)			出口价值(关平两)		
	岳州	长沙	合计	岳州	长沙	合计
1901	63	—	63	3,245	—	3,245
1902	181	—	181	6,822	—	6,822
1903	553	—	553	20,297	—	20,297
1904	813	—	813	26,964	—	26,964
1905	30	1,167	1,197	1,468	59,629	61,097
1906	19	1,603	1,622	1,002	78,455	79,457
1907	—	943	943	—	47,604	47,604
1908	—	762	762	—	57,565	57,565
1909	—	1,203	1,203	—	160,011	160,011
1910	1	959	960	68	158,067	158,135
1911	1	1,219	1,220	72	188,250	188,322
1912	—	1,182	1,182	—	225,626	225,626

资料来源：曾赛丰、操有鹏：《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第 2 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35—336 页。

从上表可知，民国伊始，夏布可使湖南每年可增加 200 余万元收入，“裨益农村经济实为重要”，但是由于印度绸物美价廉，“国人爱其美观，价亦不贵”，以致国人“多摒弃夏布补用，转而竞用此托舶来品”。^④民国时期，醴陵商人“自行漂染，运往各埠销售”，从而才使“外间始知有醴陵夏布”。^⑤

⑤熊元彬：《机制洋纱引发云贵内外市场联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2 月 20 日。

⑥《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 30 页。

⑦《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 3 册，工业·纺织工业，宗青图书公司，1935 年印行，第 45 页。

⑧夏立士：《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湖南历史资料》1979 年第 1 辑。

⑨詹天佑：《湖南乡土地理教科书》第 3 册，1910 年，第 7 页。

洋纱、洋布与土纱、土布各有其优势。虽然洋纱物美价廉，且采用洋纱织布“轻细有余”，但是“厚暖则不足”，以致清末之时，“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岳州等地所产土布——引者注），几如批沙拣金”。^⑥

棉纺织机器的购置和不断改良是近代棉纺织竞争的重要表现之一。1906年拉梭机与铁轮机相继从日本输入中国之后，湖南等地民众开始仿造。据1906年1月31日《时报》所载，“近有某君在湘潭创办瑞锦机器织布公司”，其所织的洋纱、各种花布，“销售颇旺”，继而在省城长沙、常德等处纷纷设立了支店行。同时，时报还指出，近年来，湖南省增设的织布机坊，“不下数十家，皆用东洋纱，织成布正，销场甚广”。湖南人采用“东洋纱”织布，并远销云贵等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人对洋布的抵制。

就醴陵棉纺织机器而言，最初“皆用木机”、射机，之后改良为扯机，日产布匹由三丈增至五丈。1914年以后，醴陵又有挺子机、散丝机、纹机等，“于是花纹布皆可制造”。之后，醴陵使用铁机，日产布疋八丈。1921年冬，醴陵人士议以赈捐余款筹设了醴陵第一平民工厂，购置60架铁机。1923年，醴陵平民工厂通过招商承租的形式，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而且其“出品尚优”，。1927年以后，停办，但1941年4月，醴陵县政府设立了民生工厂，招募20名学徒，出产葛丝呢、花条布、花格布、白官布、白洋布、竹布、节花布、罗巾、毛巾和花门帘等十余种产品。^{⑦⑧}

在发展实业的影响下，上海等国产纱也大量输入湖南，从而使湖南的机制纱、布业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平江布，经改良之后，闻名湖南各地，长沙、芷江、湘潭、洪江、邵阳等地的纺织从家庭工业逐步向机坊工业发展。据1908年估计，岳州布疋产量2万匹，而常德布疋则高达60万匹^①。

此外，实业救国和抵制日货运动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湖南等国内棉纺织的竞争力。如清末夏布，其销路最旺，年产量达三四十万匹，价值约一百五六十万元，“除销本国外，尚运销朝鲜、日本南洋一带”^②。邵阳县素来作为妇女劳动的家庭纺织业，已经根本被洋纱打倒了。

辛亥革命后，湖南与全国政府一样掀起了振兴实业的热潮，从而加强了自身的机械化程度和工业化进程。1912年，湖南都督府参议吴作霖“痛外货之充斥，生民之穷困”，使湖南近代机器棉纺织开始出现。^③吴作霖的呈报获谭廷闿的批准，于是向财政司借支湘纹银60万两，创办了官督商办的经华纺纱公司。该公司在长沙购地256.93亩作为厂址，陆续购置英商安利洋行纺纱机4万锭，锅炉3台。同时还向德商购置了3台550千瓦的透平交流发电机和260余台电动机。^④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公司收归官办，易于湖南第一纺纱厂。1916年，谭廷闿第二次督湘，任命财政厅长袁家普兼治纱厂，成立纱厂工程筹备处，“对于经营纱厂，不遗余力，网络专门人材，共策进行”，因而厂屋、烟筒等，以及“机械之装置亦先后完备”^⑤。1917年经绅商朱恩线等组织华实纺纱股份有限公司，承租纱厂。1920年，谭廷闿第三次主政湖南，仍任命袁家普经理厂务，从而完成了厂房建设和机器设备，开始生产的湖南第一纺纱厂即为近代湖南第一家机器纺织厂。1921年正式开工纺纱。1926年北伐军人湘，将纱厂收为公办，直属省建设厅，仍名湖南第一纺纱厂。1928年，彭蔚雍为厂长，除了扩充一万纱锭外，还筹办织布厂，将厂名易为湖南第一纺织厂。1932年，织布厂建成，有248台布机，成为湖南第一个，也是骨干的纺织企业。

①日本外务省：《清国事情》下册，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第253-255页。

②《禹之谟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页。

③嘉庆《宁乡县志》第4卷，赋役志，物产类。

④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湘东各县手工艺品调查》，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2年，第66-67页。

⑤陈鲲修，刘谦等纂：《醴陵县志》第6卷，食货志，工商，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⑥《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0页。

⑦陈鲲修，刘谦等纂：《醴陵县志》第6卷，食货志，工商，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即使在洋布的冲击下，醴陵夏布也曾远销海内外，与洋布争夺市场。其中，尤以 1933 年“销路最旺”。之后，在国外毛葛、荷兰纺、印度绸的竞争下，加之日本“复苛征人口重税，限制销行”，致使夏布“营业一蹶不振”。上海、武汉沦陷之后，夏布“销场益蹙”。但是，1940 年，除白兔湘、浦口市之外，醴陵夏布尚存 5 家，产品不仅运销长沙、湘潭、衡阳，而且亦远销至浙江金华，广东的曲江、坪石等地。^⑥

抗战爆发前，土纱备受洋纱冲击，因而醴陵棉花“旧产不多”，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纱价踊贵”，土纱再次兴起，因而“始多种者”。20 世纪 40 年代后，“又有美棉种输入，结实比中棉多三分之一”，以致湖南等地大多改种美棉。据 1941 年调查，醴陵全县棉产量达 2，000 担。^{⑦⁹}

综上所述，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烈刺激下，随着洋纱、洋布的不断输入和工业革命的推动，湖南近代棉纺织在前清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在备受打击的同时，不仅使棉纺织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近代湖南与外地市场资源的整合和市场的联动，甚至工业化进程。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第 458 页。

②《省银行经济半月刊》1941 年 2 月 25 日，第 8 页。

③《湖南第一纺纱厂之调查》，湖南《实业杂志》第 26 号，1919 年 12 月刊。

④《湖南省志·纺织工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527 页。

⑤《湖南第一纱厂之调查》，湖南《实业杂志》第 26 号，1919 年 12 月刊。

⑥陈鲲修、刘谦等纂：《醴陵县志》第 6 卷，食货志，工商，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⑦陈鲲修、刘谦等纂：《醴陵县志》第 6 卷，食货志，工艺原料，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